



苏州俞墩墓地再辨析



唐锦琼

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)

2012年,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阳山东麓的俞墩进行发掘。俞墩是一处相对较为独立的孤山,距离阳山主体尚有一定距离。山体底部呈椭圆形,西北-东南径约125米、东北-西南径约100米、高约10米。俞墩的基底为凝灰岩山体,以上有0.6~1米的覆土,未见有文化层堆积,表明此处是一处单纯的墓地。俞墩上共发现7座墓葬和1处器物群,涵盖了马桥文化、西周、东周等几个时期,包含了竖穴岩坑墓、竖穴土坑墓、石床型土墩墓等多种墓葬形制,是一处基本完全发掘的土墩墓葬群。审读报告,觉得墓地有一些可进一步探究之处。以下仅就此墓地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,或可对本区域内相关研究有所裨益。

墓地的整体堆积情况是基岩以上的覆土“分别为①表土层,②黄土层,③碎石层,……第①表土层分布不均,第②层局部缺失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文中在介绍M4时,提到此墓“为石框型土墩墓,即在平整过的基岩面上堆筑铺设较规整的小块石而形成石床,用较大石块标示出墓葬边缘。”反映出此处的第②层堆积下直接叠压的基岩,未有第③层碎石层分布。可见,这三层堆积中,除了第①层堆积外,其余两层堆积均在某些区域有所缺失。但由于发掘者未详细介绍土墩的总体堆积分布状况,土墩上部堆积详细情况,特别是土墩的原有高度、堆积状况,特别是后期对土墩的破坏情况已无从得知。

按照开口层位区分,墓地内发现的七座墓葬可划分为2组。第一组仅有M7,开口第③层碎石层下,第二组包括M1—M6,均开口在第②层下。发掘者还介绍到M1和M3均打破下方的第③层堆积。M7的

时代属马桥时期,第二组墓葬的时代均在两周时期,之间有着明显的时代差。在土墩上发现的器物群(Q1)未介绍具体层位关系。但根据其出土遗物推断,时代亦在两周时期。因此Q1较有可能也是开口在②层下。这样的话,以第③层堆积为间隔,整个土墩上墓葬可分为两个大的时期,第②层下开口的遗迹单位属第二个使用时期,构成一处墓地。这批墓葬也是本文主要的讨论对象。

墩上的6座两周墓葬从形制上可分为三种类型。M1、M3和M5属浅坑型竖穴墓。M2和M4为石框墓或者石床墓,属平地起堆。Q1类的器物群位于地面上,未见有明显明显的范围或者坑穴等,堆积方式也属于平地起堆。M1、M3和M5残存深度在0.15米左右,最深仅有0.25米。这几座墓葬均为②层下开口,打破下方的第③层碎石层。这些墓葬应该未或稍触及下方的基岩。M2和M4为石框墓或者石床墓,以及Q1均是直接在第②层下开口,直接坐落在第③层碎石层或基岩上。这些遗迹单位的上部开口均被破坏,原有深度已然不明。但M3残深约0.1~0.15米,其中M3:1硬陶罐复原高度约20.8厘米, M5残深约15~20厘米,其中M5:2硬陶瓮复原高34厘米。这两件器物的高度均超过墓葬的残存深度,表明墓葬的上部已被破坏掉相当一部分。土墩上部具体破坏掉深度难以推断,是否有埋藏较浅的墓葬已被破坏掉也无从查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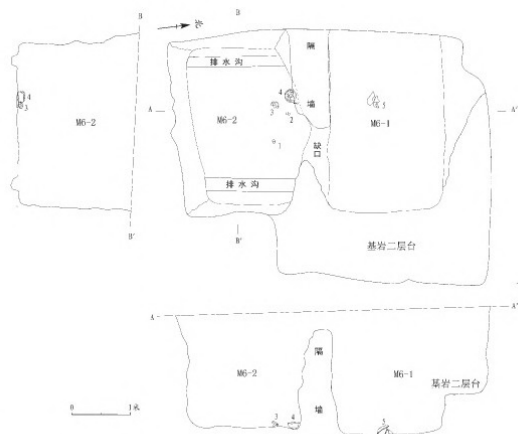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批墓葬中,M6是其中最大的一座。发掘者认为此墓是俞墩墓地的中心性墓葬,在整个墓地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纵观简报,此墓有诸多违和之处,需详加辨析。为了方便阐述,将简报中相关描述

引述如下。

M6 位于 T4 内。开口于第②层下,为打破基岩的长方形竖穴岩坑墓。由山体基岩下挖形成,石室南北总长 5.30、东西总宽 3.50~4.30、深 1.80~2.00 米,墓室中部偏南有一条东西向的石墙将石室空间分成南北两部分,构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墓室。北侧墓室编号 M6-1,南侧墓室编号 M6-2。石墙厚 0.60、长约 1.70、高约 1.70 米,石墙下半部分为基岩墙体,上部分垒砌较大块石。石墙东部凿出 0.50~0.60 米的缺口。缺口可能相当于后期双室墓之间的过仙洞,其用途可能为了南北两墓室之间墓主灵魂沟通。其中 M6-1 墓口向东扩展约 1.00 米左右。墓室坑壁略斜,局部有加工开凿痕迹。骨架无存,方向为 86°。

M6-1 墓口东西长 4.30、南北宽 2.60~3.60、深 2.00 米,在距墓底 0.60~0.70 米处的东面与北面分别凿有宽约 1.10 和 0.80 米的二层台。墓底部分东西长约 3.00、南北宽约 1.95 米。M6-1 填土上层为 0.60~0.80 米的纯净黄土,下层为黄灰土,略发灰褐。墓室近底部出土 1 件残泥质陶罐。填土中出土残原始瓷盂 1 件。基岩二层台上无遗物出土。

M6-2 墓口东西长 3.10、南北宽 2.00~2.20、深 2 米。墓底东西长 1.70、南北 1.50~2.00 米。墓坑内上层填 0.15~0.30 米的纯净黄土,下层为黄灰土。墓室北侧的石墙近底部分由于向北开凿而略向外凹。在距墓口约 1.10 米左右,靠石墙侧发现青铜杯形器 2 件;在墓底中部紧贴石墙处,出土陶盒、陶豆、鼎足等。M6-2 墓底有两条南北向打破基岩的凹槽,长约 1.55~1.65、宽 0.15、深 0.06~0.10 米。(图一,俞墩 M6 平剖面图)



图一 俞墩 M6 平剖面图

1、2.青铜杯形器 3.灰陶豆 4.灰陶带盖盒彩 5.印纹陶罐(腹片)

发掘者对此墓的总体认识是“该墓早期被彻底破坏,后利用竖穴岩坑进行再次埋葬”是在“战国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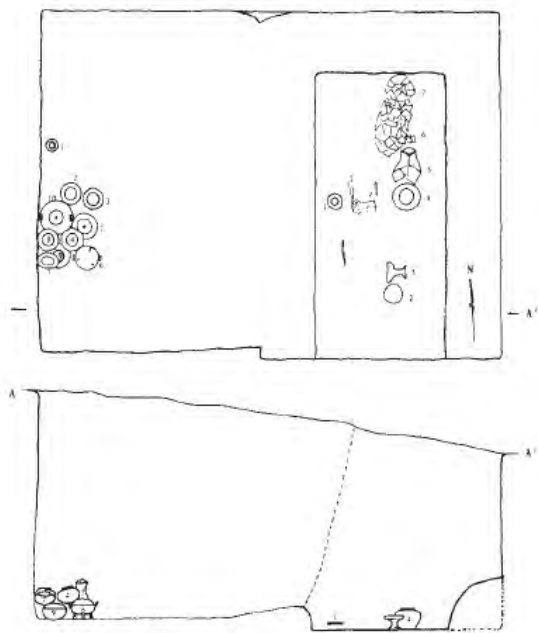
晚期即遭楚人的报复性“毁墓”,并利用原墓坑进行再次埋葬后重新填土和封土”的。具体过程为“推测 M6-2 是战国楚人利用春秋墓葬开挖的竖穴岩坑,同时墓底新开排水沟而略微改变了原有的墓葬结构,之后楚墓又被盗掘。”依据发掘者的表述,这座墓葬先后大致有着以下三个过程:①在春秋时期(另有认为是西周中晚期)形成最早的墓室结构,②在战国时期被楚人破坏,稍微改变墓室结构作为墓葬使用,③被盗掘破坏。此墓可谓“身世”坎坷。下面将逐一分析墓葬的各个过程,进而对墓葬原有状况有全面的认识。

1、对于墓葬的最早形成时代,发掘者认为是春秋时期(抑或西周中晚期),此后在战国时期被楚人改建和利用。判断一座墓葬是否经过改建,首先是依据的是前座墓葬残留的各种痕迹,如残留的早期墓坑,稍有错位的墓葬方向,残存的早期填土等。但检视发掘报告,M6 两个墓室内填土各自上下一致,是一次性填埋的结果,未见有早期填土的残留。墓葬的两个墓室方向一致,特别是北侧墓口呈一线分布,显得极为规整。

遗迹单位的时代,多是在出土层位的基础上,依据出土遗物来判断。因此,如果此墓被早期使用,或许有相应的遗物留存。对此,发掘者仅在一篇论文中提到,“北俞墩 M6,由于早期被盗掘,仅残留 2 件‘杯形’铜器”。这两件杯形器均为直口,直壁,圆底,口径 6.6、底径 5.8、高 5.2~5.6 厘米。发掘者直接认定这对器物属早期遗物,未给出相应依据。青铜容器中殊少出现此类器形。这两件器物成对出现,较有可能是车马器。在战国早期的山东临淄淄河店二号墓内的 18 号车上出土有一对衡末饰,也是呈圆筒状,近似“杯状”,与俞墩 M6 的器物极为近似,只是直径较细而已。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车马坑 ZK5:49 铜质衡末饰也是此种形制。三门峡西苑小区战国车马坑中出有两件与之类似的骨质衡末饰。由此推断这两件器物可能是衡末饰,时代约在战国时期。这两件器物应该不是早期墓葬存在的证据。

发掘者推断墓葬有晚期破坏的情况,当是根据两个墓室内填土的差异而得出的。M6-1 下层填土为黄灰土,略发灰褐色,M6-2 下层为黄灰土,两者有着显著的差异。但如果按照发掘者所推测的是将前座墓葬掏空(如若未完全清理,当会有早期填土残留,与前文中填土上下一致相违),此后又重新一起使用的话,两侧填土当一致,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。因此,两者应该不是同时形成的。苏州真山四号墩的 M1 和 M2 发掘也有类似现象。这两座墓东西并

列,方向一致,北侧墓边基本东西一线,由于长度不同,南侧墓边稍有参差。西侧的 M1 打破东侧 M2。根据出土遗物判断,M1 在西汉早期,M2 的时代在战国晚期。两座墓形制略近似于后世的异穴合葬。(图二,真山四号墩 M1、M2 平剖面图)俞墩 M6 的形制与之类似,也有可能是有着打破关系的两座墓葬。两个墓室的孰早孰晚还需根据各自的时代来确定。



图二 真山四号墩 M1、M2 平剖面图

2、墓葬的时代。M6 两个墓室内均出有遗物,且位于墓室中的不同位置和堆积中。M6-1 内的遗物均出于填土中,除一件原始瓷盅外,在近底部填土内出有一件残泥质红陶罐的腹片,填土中还出有数片与之纹饰、质地相同的陶片,应属同一器物。M6-2 墓底近石墙侧(北侧)发现 2 件青铜杯形器,以及陶盒、陶豆、鼎耳、鼎足等。

发掘者认为 M6-2 墓底的灰陶盒、灰陶豆以及未发表的鼎足、鼎耳等“均为典型的楚式陶器”,可信从。如陶豆(M6-2:3)为圆唇,敞口,盘外壁较直,转折处为圆弧形,豆柄下方残,原有高度不明。其与上海福泉山战国晚期的 M88:17 陶豆形制近似,仅腹部略浅而已。福泉山 M4 中也出有一件与之类似的陶豆(M4:11),时代属战国晚期。因此,可推断这件陶豆的时代也属于战国晚期。结合前文所述的铜衡末饰的时代,M6-1 的时代可能属于战国晚期。

M6-1 填土内出土的残红陶罐为橘红色陶,仅剩腹片,颈部饰十多道弦纹,下饰菱形填线与小方格组合纹。此类纹饰的器物在丹徒青龙山大墓^⑩中有较多发现。青龙山大墓的时代属春秋晚期,则此类陶罐的

时代当也在这一时期。这件出于填土的器物大致可确定 M6 的时代上限,不会早于春秋晚期。

由此,大致可确定 M6 的形成过程,首先是形成东侧 M6-1,此后在西侧紧贴着其西边(更有可能打破西侧墓边)形成 M6-2。即形成西侧的 M6-1 打破东侧 M6-2 的格局,恰与真山四号墩 M1 与 M2 的早晚关系相一致,恐怕并非巧合。

3、M6 的性质。发掘者指出 M6 内出土遗物有着浓郁的楚人风格(现在看来主要指 M6-1),是楚人的墓葬。

春秋中晚期的寿梦在位时才“始通于中国(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)”,其中外来文化中最突出的是楚文化的因素,当是与当时频仍的吴楚战时有关。在考古学上发现了诸如六合程桥墓^⑪、苏州何山墓^⑫、苏州虎丘墓^⑬等遗存。这些墓葬内均出有典型的楚式铜器,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本地文化特色的铜器和陶器等^⑭。此后随着战国中期(公元前 306 年)“楚威王兴兵而伐之,大败越,杀王无疆,尽取故吴地至浙江(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)”,战国晚期(公元前 262 年)春申君“请封于江东。考烈王许之。春申君因城故吴墟,以自为都邑。(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)”,在此背景下,本区域内出现一批较为典型的楚文化墓葬,主要包括:上海福泉山 M88^⑯、上海青福战国墓^⑰、上海嘉定外冈古墓^⑱、苏州真山战国墓^⑲、苏州真山四号墩诸墓^⑳、苏州善山 M7^㉑、无锡施墩 M5^㉒、安吉五福楚墓^㉓、安吉荃坝楚墓^㉔等。这些墓葬的主要随葬品情况如表一。

由表一可见,这批楚墓的主要陶器组合的主要方式为鼎、豆、盒、壶,另加杯、钗、勺等,另外陶俑也较为常见。相较之下,俞墩 M6-2 随葬品的配伍有鼎、盒与豆三种,虽然数量仅有 1 件,与其他墓葬内大多成对或者偶数配置的情况稍有差异,但仍可与其他楚墓等观,可以视作一座较为单纯的楚系墓葬。

M6-1 内空无随葬品,仅在填土中出有原始瓷盅和印纹陶罐,墓底未见有随葬品。考古学上,对这种情况多认为被盗扰导致随葬品的缺失。但发掘者在《简报》的结语中明白无误地指出“M6 在发掘填土时经仔细观察,未见盗洞。M6-1 墓室中部在下降 0.30~0.50 米即发现有数块大石块,石块周围填土略显灰白,异于周边的黄土。去掉石块后再向下发掘 0.30~0.40 米之后填土颜色基本一致,为黄灰色土,质地较硬”。除非后期将整个墓室内填土完全掏空,才有可能填土堆积上下一致,完全不见盗洞。对此,不敢妄加猜测。此处仅将这一现象点出,留待资料的丰富再予以探讨。

表一 太湖周边地区战国楚墓随葬品登记表

墓葬	随葬品	陶器								其他
		铜器	鼎	豆	盒	壶	杯	钫	甗	
福泉山 M88			2	2	2		2	2		勺、俑、圜底罐 ^⑤
福泉山一号墓			2	2	2	2				
福泉山二号墓			2	2	2	2	2			匜、罐
福泉山四号墓			1	1	1	1		1		勺、俑
嘉定外冈墓 ^⑥			√	√			√	√	√	勺
真山 D1M1	鼎、盃、兵器、印、灯									郢爰
真山 D2M1	镜		2		2		2	2		勺、俑、圜底罐
真山 D3M1			4		2 ^⑦	2			2	熏、俑
真山 D4M2			1	2				1		原始瓷罐
真山 D4M3	铜、镜		2	2	1	4			1	罐
善山 M7			1	1	1		1	1		勺、俑、匕
施墩 M5			2		1 ^⑧		2	2		俑、钺、碟
五福 M1	盃、戈、剑、镜		6	6	4		4	6		大量漆器、木俑等
茆坝 D1M2			2		1	2				
俞墩 M6	车马器?		√	1	1					

4、墓地的探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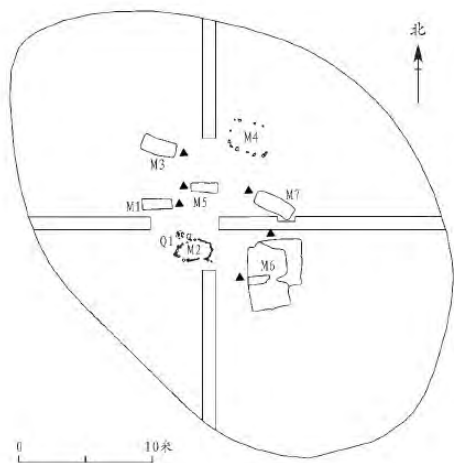
发掘者将俞墩墓地 M2、M4、M5 的时代推定在西周中晚期，将 M1、M3 和 Q1 时代判定为春秋中期，俱可信从。总而言之，俞墩墓地有着下四个使用时：在西周中晚期，出现 M2、M4、M5 等一批墓葬，形制有浅坑墓、石框墓和石床墓等；到春秋中期，又有浅土坑 M2、M4，以及器物群 Q1；在春秋晚期或更晚些时候，出现一座深岩坑的 M6-1；到战国晚期又出现了一座与 M6-1 并列的楚人墓葬(M6-2)。

江南地区土墩墓的形制有着清晰的发展演变脉络：墓葬范围早期多平地起堆，以后出现墓坑，墓坑也是由浅坑型逐步发展为深坑型，这是受到中原文化，特别是楚文化影响的结果。从以上墓葬序列来看，也与这一规律大体相符。

发掘者对墓地的基本判断是“……M6 为该墩中心高级别大墓，M1~M5 为 M6 的陪葬墓^⑨”。因此主

墓要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，以及诸墓的年代要其他附属性遗存的年代大体相当，才能构成一处有主有次，层级有序的墓地结构。

俞墩顶部是一个直径 30 余米，地势较平缓的台面，未有明显的中心最高点。发掘者亦未提供发掘区的具体标高等信息，似乎难以推断土墩的中心位置。发掘者对土墩的发掘方法采用了以土墩中心进行的四分法发掘。这个中心点更多是基于土墩现存状况的基础上，通过发掘者的主观判断来确定的，或许并非山体的最高点。发掘者发表了全部墓葬的平剖面图，剖面上墓口的高差，大致反映出地表的高低状况。依托剖面图的复原，可知土墩的相对高点在 M1、M3、M5 之间，即在现在土墩中心的略西北位置。M6 位于整个土墩的西南侧，远非土墩的中心处和高点，无法形成众星拱绕的格局。(图三，俞墩墓葬平面分布图(▲表示各墓剖面表现的相对高点))从墓葬的



图三 俞墩墓葬平面分布图
(▲表示各墓剖面表现的相对高点)

分布来看,西周中晚期,土墩中心的位置出现 M1、M3 和 M5,三者呈西南—东北一线分布,到春秋中期,出现的 M2 和 M4 分布在土墩西北侧,亦呈西南—东北分布,方向均大致冲向东侧。M6 更晚出现,却分布于土墩的东南方向,并且呈南北方向,与 M1~M5 东西走向的完全不类。

前文已述,墓地中墓葬时代不一,且延续时间较长。对于典型的一墩多墓结构,曾有学者推测一个墩子或许最多只能安葬 3 到 4 代人^⑩,换算下来,时间跨度不过百年。而俞墩 M1 至 M6-1 从西周中晚期延续至春秋晚期或稍后,时间跨度远远超过了这一时间范围。

江南地区的一墩多墓现象可划分为两种形式——向心结构与不规则结构。前者的墩内墓葬布局经过精心安排,中心墓葬与周围墓葬之间的主从关系明显,很可能是出于某种规制而成。此种形制的典型为句容寨花头土墩墓 D2^⑪、句容鹅毛岗土墩墓 D2^⑫等。后者则大多为晚期墓葬选建于早期土墩之上或旁边逐渐形成,墩内墓葬间不具备明显的主从关系^⑬。由此看来,俞墩墓地当属于后者,只是因为地势较高,各时期均有墓葬分布其上,逐渐形成的,而非发掘者认为的有着明确的主从关系,排列有序的墓地。

注释:

⑩苏州市考古研究所:《苏州阳山俞墩土墩墓发掘简报》,《东南文化》2012年第4期。下引此墓地资料,不另加说明者,均引自该简报,恕不一一注明。

⑪丁金龙、陈军:《苏州地区周代土墩的发掘与研究》,《东南文化》2012年第4期。

苏州市考古研究所:《苏州阳山俞墩土墩墓发掘简报》,《东南文化》2012年第4期。

⑫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》,《考古》2000年第10期。

⑬洛阳市文物工作队:《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》,第446页,文物出版社,2009年。

⑭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三门峡市西苑小区战国车马坑的发掘》,《文物》2008年第2期。

⑮周丽娟:《上海青浦福泉山发现一座战国墓》,《考古》2003年第11期。

⑯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:《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》,《考古》1988年第8期。

⑰丹徒考古队:《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》,《东方文明之韵——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岭南美术出版社,2002年。

⑱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南京博物院:《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》,《考古》1965年第3期。

⑲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:《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》,《文物》1984年第5期。

⑳苏州市博物馆考古组:《苏州虎丘东周墓》,《文物》1981年第11期。

㉑对此作者将有专文阐述。

㉒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:《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》,《考古》1988年第8期。

㉓黄宣佩:《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古墓清理》,《考古》1959年第12期。

㉔苏州博物馆:《真山东周墓地》,文物出版社,1999年6月。

㉕苏州博物馆:《苏州真山四号墩发掘报告》,《东南文化》2001年第7期。

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:《苏州木渎古城 2011—2014 年考古报告》,《考古学报》2016年第2期。

㉗谢春祝:《无锡施墩第五号墓》,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6年第6期。

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安吉县博物馆:《浙江安吉五福楚墓》,《文物》2007年第7期。

㉙金翔:《浙江安吉县堇坝村发现一座战国楚墓》,《考古》2001年第7期。

㉚简报作者称作壘,根据形制,此处统一为圆底罐。

㉛墓内出有 14 件遗物,但作者未介绍其中每类器物的具体数量,只得以“√”表示。

㉜报告作者称作敦,此处根据形制统一为盒。

㉝简报作者称作簋,此处根据形制统一为盒。

㉞李虎仁、周润垦、原丰:《向心结构的多墓土墩》,《中国文化遗产》2005年第6期。

㉟南京博物院:《江苏句容寨花头土墩墓 D2、D6 发掘简报》,《东南文化》2007年第7期。

㊱镇江博物馆、句容市博物馆:《江苏句容鹅毛岗土墩墓 D2 发掘简报》,《东南文化》2012年第4期。

㊲付琳:《试析江南周代土墩墓中“一墩多墓”的结构与形式》,《南方文物》2015年第3期。